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经济学（第六辑）

A geometrical political economy

几何经济学

〔英〕克宁汉(H. Cunyham)著 李植泉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· 经济学（第六辑）

A geometrical political economy

几何经济学

〔英〕克宁汉（H. Cunyham）著 李植泉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几何经济学/ (英) 克宁汉 (Cunynhame, H.) 著; 李植泉译.
—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6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/李天纲主编. 经济学)

ISBN 978-7-5520-1205-7

I. ①几… II. ①克…②李… III. ①数理经济学 IV. ①
F224.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6303号

几何经济学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字 数: 120千字

印 张: 8.875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205-7/F.397

定价: 48.00元 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“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”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“西学”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“百年翻译运动”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“东方”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“文艺复兴”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“西学”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“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”、“中国的文艺复兴”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“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”利玛窦（Ma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“西学”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“科学”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“西学东渐”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“范围亦限于天文）、（历）算”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“西学”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“运动”。各种原因导致了“西学”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

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“中国礼仪之争”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“西学”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“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”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“戊戌变法”之前的“西学”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“西学”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“西学”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“翻译运动”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“汉译名著”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“大学堂”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“书院”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“四书五经”之外，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“西方经典”，甚至到了“言必称希腊、罗马”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“民国西学”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“现代化”、“世俗化”、“理性化”，都与“民国西学”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“民国西学”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

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,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?“西学东渐”的代表,明末有徐光启,清末有严复,那“民国西学”的代表作在哪里?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,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,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“西学”著作,束之高阁,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,1935年,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,“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”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,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,分为:“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”。一瞥之下,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“人大图书分类法”更仔细,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“社科规划”和“文化战略”,“民国西学”却在“中国的文艺复兴”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(上海,生活书店,1935),在“社会科学·社会科学一般·社会主义”的子目录下,列有“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”等;在“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”的子目录下,列有“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”等,翻译、研究和出版,真的是与欧美接榫,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“民国西学”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,而我们却长期忽视,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“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”,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,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“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”、“中国的文艺复兴”,接续当时学统,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,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,编辑“中国文化史丛书”,一个宗旨便是要接

续 1930 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“中国文化史丛书”，重振旗鼓，“整理国故”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“西学”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“接续”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“老三论”、“新三论”、“后现代”、“后殖民”等等新理论，对“民国西学”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“严译八种”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–1971）先生那样在“西学”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“西学”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“反独裁”、“争民主”和“抗战救国”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 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“民国西学”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“断裂”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“改革、开放”以后，又一次“西学东渐”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“西学”，用新的

取代旧的,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:“熊瞎子掰包谷,掰一个丢一个。”中国学者在“西学”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,在层出不穷的“西学”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:更新的理论,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,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,或者借用,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“西学观”,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,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“西学”,一般是以五四“新青年”来代表,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“西学”,倡导“启蒙”时居功至伟,但是“新文化运动”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,也使得这一派的“西学”浅尝辄止,比较肤浅,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“民国西学”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,有一个宗旨是要“输入学理”,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,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,说“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,便曾经发行过一期‘易卜生专号’,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,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‘马克思专号’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‘杜威专号’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,也就习以为常了。”(唐德刚编译:《胡适口述自传》,北京,华文出版社,1992年,第191页)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,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“真理”的轨迹。三四十年来,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,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;从不列颠宪政学说,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,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,大致就是“输入学理”运动中的全部“西学”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:“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,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。”胡适并不认为这种“活学活用”、“急用先学”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,二十世纪中国知识

分子接受“西学”的方法论,大多认为翻译为了“救国”,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,这就是“天经地义”。今天看来,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“实用主义”,是生吞活剥,不加消化,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,或曰:是“夺他人之酒杯,浇自己之块垒”。从我们收集整理“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”的情况来看,“民国西学”是一个比北大“启蒙西学”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,我们认为“五四运动”及其启蒙大众的“西学”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,在北大的“启蒙西学”之外,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“民国西学”。或许我们应该把“启蒙西学”纳入“民国西学”体系,“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”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: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,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,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,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,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,不中不西,并非简单的外来“冲击”所致,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,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,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,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,那便是“欲求超胜,必须会通;会通之前,必先翻译”。反过来说,“翻译”的目的,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,而非搬用;“会通”的目的,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,而是一种创新——“超胜”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“民国西学”,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,值得我们捡起来,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,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“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”,献弁言于此,是为序。

2016年3月20日,于阳光新景寓所

〔英〕克寧漢 (H. Cunynghame) 著 李植泉 譯

幾何經濟學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

譯者弁言

本書原名 A Geometrical Political Economy: Being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the Method of explaining some of the Theories of Pure Economic Science by means of Diagrams, 爲晚近經濟學之名著，對經濟學權威馬夏爾教授（Prof. Alfred Marshall）所論，提出修正之點甚多。說理精澈，方法新穎，實爲吾人研究經濟學者不可不讀之要籍，故樂爲譯出。

惟是譯者學識膚淺，且於短期間譯成，草率或詞句欠妥之處，知所難免。如蒙閱者不吝指教，俾於再版時修正，實所感盼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 李植泉謹識。

序 言

本書雖然帶數學性質，但是讀者除去在學校所學幾何學以外，不需要任何數學知識，而且本書所用幾何學，內容也十分淺近。

我本來知道，若干有權威的思想家，一見圖式，便感頭痛。不過他們所以討厭圖式，實質上乃和討厭外國語的情形相同。固然，許多人都討厭讀古時字體的德文，而讀俄文和希伯來文的困難，一部分也是因為字母的奇怪難認。然而幾何方法一經領會之後，卻十分有趣；就是深奧難解的定律，一用幾何方法表示，便可以一目了然，所以很值得下一番功夫弄懂了幾何學。

介紹幾何方法到英國的，有馬夏爾 (Marshall) 教授，有貞金 (Fleeming Jenkin) 氏和哲封斯 (Stanley Jevons) 氏，所有英國的學生，都應該感謝他們。在這三位之中，馬夏爾教授，用幾何方法研究經濟學，已經有了許多的貢獻，大約在三十年以前，便已引起我的興趣；他的恩惠，我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也許有人看見本書所用的曲線，圖式所佔的成分多，真正幾何所佔的成分少，因而反對本書所用的標名。不過，如果將本書所用的曲線，一一加以檢查，便可證明這些曲線，並不僅僅是圖

式而已。因為所謂圖式，據我所知，不外目的在表現一堆事實的曲線，背後並不受任何已知的定律的支配，好像表現溫度計漲落的圖式便是。但是一個圖式的形式，一經發現果受某一定律的支配時，這個圖便不僅僅是一個圖，卻步登曲線的高位。例如等溫線和等熱線，普通都用來表示汽體體積，因為壓力和溫度的關係而起的變動，馬克思韋爾（Maxwell）氏，在他的熱學上，便叫這兩條線做『曲線』；同時他還說明了支配這兩條曲線的定律。

如果拿本書的原意來說，或者用『圖解』（diagrammatic）一詞比較貼題些，但是這兩個字普通不常應用，而且容易令人誤解，所以我還是用幾何兩個字。這兩個字，我雖然知道會受人家的指摘，不過用來表示本書所持的觀點，差不多要算最切合的了。

本書第十一章，解釋到一些曲線；這些曲線，我想將來應該和馬夏爾教授的名字連繫起來。

我研究馬夏爾氏曲線，是分成三個方面，一則使馬夏爾氏曲線和別的曲線關聯，二則由別的曲線引伸出來，可以得到馬夏爾氏曲線，三則從馬夏爾氏曲線可以變成別的曲線。

不過，在這裏我應該說明（假如我理解得他正確的話），經過和馬夏爾氏幾次通信以後，他並未完全採納我的意見。馬夏爾教授在他的經濟學原理（Principles of Economics）裏面，特別

注重短期曲線和長期曲線的差別。他的國外交易曲線，原意主要本來似爲作例解之用，同時他以爲這些曲線，祇能應用於長期常態供給 (normal supply) 上；至於我在本書後面所提的曲線裏面，有幾個他以爲祇能應用到短期供給上面。他的意思是不是這樣，我還不敢確定，假如是這樣的話，便完全和我的意旨相反。凡本書所提的曲線，都指定在平衡狀態 (state of equilibrium) 之下適用，這平衡狀態必須在臨時性的動搖都停止以後，纔能達到。或者我們不如這樣說，因爲萬事萬物，都是長流不息地在那裏搖動着，我們所說的曲線，就好像在市面保持常態情況的一刹那所攝的即時照像。例如本書第六章第三六圖討論到剩餘價值， ΣP 曲線所表示的連續成本 (successive cost)，並非指時間上連續而言，更非僅僅指短期現象而說，不過僅說明在一批物品（例如每天煤炭出產量）製成後，內中有一部分，生產成本已經比別的許多部分較爲輕減罷了。這種情形，祇要礦的生命一天存在，便會繼續有這種情形，不祇一個礦如此，就是全國的礦也都是一樣。

馬夏爾教授（參閱經濟學原理第五編第四章第 416 頁，一八九〇年版）說，在短期曲線和長期曲線之間，有很重要的差別。據我看來，卻未必盡然，所以我不能夠了解馬夏爾教授的意旨。正如同動力學和靜力學，實質上都受同一原理支配一樣，短期

曲線（代表動搖狀態下的事物情況），最終仍受支配長期曲線（代表比較的靜止狀態）的原理一樣的支配。所以這種性質的曲線，顯然同時可以應用到短期和長期，祇是在構圖的時候，必須注意，使曲線和原來指定的用途相合而已！

我們知道，說明一個人自己的觀點，這是何等困難的事體！要說明別人的觀點，自然更談不到。馬夏爾教授的先驅工作，我這裏既然終於不能不提到，所以我祇能夠說，假如我誤解馬夏爾氏曲線的性質，並不是我不曾盡力去求了解。至於這些曲線，乃為馬夏爾教授和別的經濟學家所發現，應該在這裏說明，表示我們不敢掠美。

要想用曲線解釋經濟學，總不免遇到兩種困難。一方面，假如一個人把曲線作得很簡單，便會有人非難他，說他不曾見到經濟定律所應受的限制，並且以為他所畫的曲線太粗劣而欠精巧。在另一方面，假如他盡力將所有應有的防護措施（safeguard），限制條件，例外情形和應有解說等事顧慮面面周到，再將各個設題，一一演述，那末，所畫成的曲線，便裝載過度，好像在天動說天文學末期所想像，環繞地球外圈上轉動的許多小圓圈上，所堆積的小圓圈了。不過，採行第一種方式，雖然有被人認為簡陋的危險，我以為還是從簡的好。假如有一個人，希望用數學方法解釋幾個最繁雜的問題，而所用的方法，一方面要很簡單，使對於

數學不熟習的人們也可以了解，一方面卻要使各方面都要完備無缺，即使有深奧和特別性質的東西，也須能夠將所有困難立刻解決，那末，這一個人一定是一個極不合理的人。

關於本書所討論的曲線，各個都有種種假定作基礎，在所提各種假定之下，各該曲線，確為真實無虛。不過藉曲線以求了解某問題，難易每有不同。凡是較為困難的，便須加用曲線，限制條件也要加嚴格。我們知道，金屬物各部分有各部分的情性，表面有磨擦，見熱又會膨脹，用後構造會起變動，容易生鏽，屢經打擊之後會軟化，以及其他種種性質，機械工程師設計機器時，不得不時時加以注意。然而機械學或動力學上的定律，只一簡單的公式，所有彈性和磨擦作用，都不會計入，並沒有人因此而求全責備。我們所說的曲線，方法和他們一樣，當然並無不可。實際上，在分析一個問題時，惟有用笛卡兒（Descartes）氏的方法，將一個問題裏面所包含的因素，一一分析開來，然後將一批因素隔絕，只分析另一批因素，這樣一批一批的分析，最後纔可以得到整個結果。牛頓運動第三定律所用的方法，以協力（co-acting forces）獨立討論，方法應用的範圍，比在動力學上為廣。實際說來，差不多只有用這一個方法，以有限的人力，纔可以了解極複雜的問題。

福克斯維爾（Foxwell）教授給我許多意見，我十分感謝。他

的『經濟學圖書館』，規模宏大，受惠的人一定很多，聽說將要移設在倫敦大學的新校舍裏面。

1904年，七月十四日，克寧漢 (H. Curynghame) 於英國倫敦西南區克倫威爾 (Cromwell) 路 134 號。